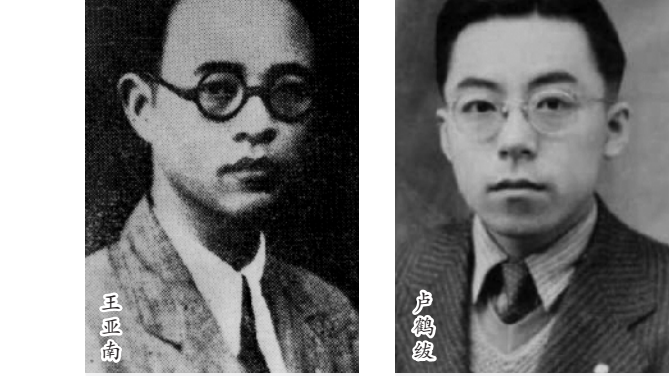




中大文学院旧址
邓琼摄



王亚南 卢鹤绂 马思聪 卫梓松 丁颖

民国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一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已成经典。将此语用于1940-1945年间，在抗战烽火中偏处粤北坪石、栖身山野村镇的国立中山大学，虽八十载而下，犹力透纸背。

这里没有大楼，却幸有一批以教育与科研为天职的“坪石先生”们，凭一腔传播真知、报效国家的信念，坚守讲堂，带领着承担民族科学文化传承使命的青年学生，用读书人的方式救国救亡。

“坪石先生”是谁？是《资本论》的中文译者、经济学家王亚南；是世界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能之父”的卢鹤绂；是音乐大家马思聪；是中国图书馆奠基人之一杜定友；是确立“珠江三角洲”地理学说的地理学家吴尚时；是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丁颖；是文理皆通的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开创者黄际遇；是“岭南词宗”詹安泰；是以身殉国的建工系主任卫梓松……

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他们蔚然大家；在民族大义前，从来坚贞不拔。无论来自富有的侨乡，还是辞别优渥的异国，当他们置身坪石这片岭南土地上，就把个人的安乐轻抛度外，以身示范，护持文明。

盛夏，武江之畔的坪石武阳司村比往日多几分热烈。自从7月1日，一场名为“真理光芒——中国传播《资本论》最早的课堂”的主题展览在村文化站开幕，整个七月，每天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坪石）工作专班的何昆亮老师和几位同事，七月份一直在此担任讲解。他告诉我们，来参观的很多韶关和坪石当地的党员、教师都第一次知道，这里是《资本论》的翻译者、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开拓者的之一的王亚南先生，曾讲学四年的地方。

王亚南1940年8月到中大任教后，就住在武阳司村，还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野马轩”。与他一同翻译《资本论》的郭大力先生，也南下任教于连县的广东省文理学院。自1938年《资本论》中译本出版后，机缘巧合，粤北因他们的到来而诞生了抗战时期中国传播《资本论》的

护持文脉弦歌不辍 先生风骨沾溉后昆

烽火环伺中，中大“坪石先生”坚守讲堂、醉心研究，以读书人的方式参与战斗

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王亚南 卢鹤绂 马思聪 卫梓松 丁颖

1941年11月，设在坪石塘口的中大理学院物理系迎来了一位新教授，他就是刚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即归国的核物理学新星卢鹤绂。

当年以“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信念归国的年轻科学家，今天已被尊为“中国核能之父”，是杰出的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11位“两弹”元勋中过半都是他的学生。而奠定卢鹤绂学术地位最为关键的早期论文《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应用》，即是1942年4月写定于塘口村，1944年发表在重庆的《科学》杂志上。该文第一次向国内全面介绍了核裂变的实验发现和理论认识及其大规模利用的可能性。

卢鹤绂曾回忆：“物理系在一座供奉马援的古庙中。在这里我给四年级男女学生六人讲授了理论物理、核物理、量子力学、近代物理等课。因为我主要用英语讲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另一方面要面对的，则是种种极端贫乏的生活条件。长子降生前，因当地没有医疗条件，夫妇俩只得辗转小舟、火车去湖南耒阳，直至卢鹤绂自己在人力车后助推……一推进医院，孩子就降生了。

坪石时期的中大理学院还有地理系很引人注目。系主任吴尚时从法国留学后来中大任教，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以坪石为根据地，走遍粤北。他是“珠江三角洲”地理学说和“丹霞地貌”的主要确立者和奠基人。

1941年吴尚时带领地理系师生开展密集的学术实践，短途调查每星期一两次，长途每月一次。吴夫人李慰慈曾回忆：“到了坪石，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一边进行讲课，一边带学生、助教作大量考察，湘、粤一带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有一次，竟迎面而遇猛虎，只好躲进了庙里。”《粤北红色岩系》《丹霞南雄红岩层位之新见解》等论文就是这时期考察的成果。

1941年6月，中大文学院从较远的清洞迁回离坪石老街较近的铁岭，租借原粤汉铁路局所盖的几幢简易小楼办公。小楼中如今还存一栋，就在公路边，虽饱经沧桑，仍可发现一些西式细节。

那时文学院有教授18人，除担任院长的历史哲学家朱谦之，还有陈安仁、詹安泰、黄际遇、吴康、李笠、岑麒祥、黄学勤等著名教授，以及新剧专家洪深这样的文化名人。

“传奇教授”黄际遇此时从较远的清洞迁回离坪石老街较近的铁岭，租借原粤汉铁路局所盖的几幢简易小楼办公。小楼中如今还存一栋，就在公路边，虽饱经沧桑，仍可发现一些西式细节。

那时文学院有教授18人，除担任院长的历史哲学家朱谦之，还有陈安仁、詹安泰、黄际遇、吴康、李笠、岑麒祥、黄学勤等著名教授，以及新剧专家洪深这样的文化名人。

“传奇教授”黄际遇此时

“坪石先生”们一直被历史铭记着。在坪石三星坪对望新村的武江渡口，“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为当年此地中大工学院所立的信息柱上，第四层一个空白格子如今被郑重填上：建筑工程系主任卫梓松的照片。研究者们曾遍寻不获，直到不久前，终于在卫先生早年任教的东北大学旧档案中找到了。

纪念，不仅因为卫梓松是1942年之后坪石中大各校区校舍的设计、监造者，学子眼中的好老师，还有——1945年3月坪石被日军围攻时，卫先生因病未随学校大部队撤退，日军屡次诱降他都不就，最终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殉国。

搜寻还在继续，“坪石先生”们的群像愈加丰富。他们毕生从事的事业、秉持的家国情怀，始终都映射着坪石岁月的光华。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意志，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曾任中大经济系主任、法学院代院长梅森彬，曾兼任中大研究院教育研究所导师的林砺儒，还有李达、马思聪、洪深……这些在抗日烽烟中同饮武江水



中大提出并践行了“新教育中国化”理论

教授上课一身泥
田野深山忙调查

羊城晚报：那么“新教育中国化”的理论对于中大后来的办学，特别是抗战坪石时期中大大师生的科研和教学有什么影响？

徐俊忠：“新教育中国化”不仅是中山大学提出的一个路标性理论，它也非常真诚地践行这一理论的逻辑来办学，努力推行“新教育”，努力与中国实际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

中大办农学，是搞在地化的，搞水稻育种，搞土壤普查，搞蚕桑，搞茶叶、搞生物防治等等，为此，教授常常是一身泥巴一身汗的。即使是文科，学术方式也不仅仅局限于面对古人旧书，而是强调田野作业，边疆调查、少数民族调查，收集民间文学素材，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调查。这种重视研究活生生的社会，从社会经验现象的归纳中得出新知，就是新教育的重要特征。

即使在逃避战乱的迁徙颠簸中，中大坚持这种教育方式依然是自觉的。不论是到澄江，还是到韶关，一经安定，各种科考、普查工作，以及各种结合在地情况的研究工作就很快开展起来。因此，做了大量服务在地民生事业的事情，产生一批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成果。例如医学院的梁伯强教授完成《日本住血吸虫在粤北之传播》，黎希干教授的《粤北瑶山卫生考察报告》；农学院为解决广东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几乎负责全省推广优良稻种的全部研究以及选种、育成繁殖等工作；地理系绘制《广东省政治经济图》，还有《乐昌盆地地理纲要》《浈武二河之水文》《曲江之潦水与预防》……至于各种农事培训、公共卫生知识推广，开办民众学校，传播文化知识等等的活动更是数不胜数。

庄先生认为：“我们以往的错误，便是把实业已经发达的国家的教育制度，搬到中国来，所以只是造成了若干的高等游民，于国家社会毫无补益。”他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有一个基本要义：中国的教育必须适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和经济发展；真正中国化的教育，需要借鉴各国经验，但归根则要依靠中国人立足本国实际的探索与创造。

抗战时期，粤北曲江由落后的小山镇一跃而成为与昆明、成都齐名的文化据点和广东抗战时期文化中心。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陷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1939年1月，广东省国民政府北迁，曲江由山区小镇聚变为战时省会。在广州、武汉等地的文化人，颠沛流离之后，其中相当部分在曲江得以重新聚集。

曲江先后出现了《北江日报》等9家报纸和《新华南》等7种刊物，出版机构陡然增至34家。1941年曲江有书店43间，占全省总数的三分之一；印刷厂30间，超过全省总数的一半。

文化人纷纷走上前线，以笔当枪。钟敬文采写了《抗日民族老英雄》《指挥刀与枪笔》《牛背脊》等作品，描绘了一批抗日将领的动人形象。戏剧活动得到相当的普及和提高，知名文艺家吴晓邦、梅耐寒、洪深、熊佛西和何培良来曲江指导。音乐人深入农村、前线、军营，马思聪等音乐名家时有公开演出。

院长唐士其指出，国际关系说到底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根本在于国家间百姓的理解和交流，而教育则是培育民间相互理解的重要途径。从洋务运动时期的赴美幼童，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留学热”，一代代赴美中国留学生为中国、美国以及中美关系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美国首任亚裔大使、美国前驻尼泊尔大使张之香女士曾经指出，中美之间教育的沟通和交流是中美关系最后且最为重要的支柱和基石，“（教育）应该是有隔绝作用，免受政治经济的影响。”但是近年来，美国频频将教育问题“政治化”“安全化”，以“美须有”的罪名调查、打压，甚至监禁中国在美国学者。

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政府终止两国政府间具有超过30年历史的“富布莱特”教育交流项目。为此，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傅高义表示，美国的这项政策正把我们的中国朋友推向对美反感的方向。

如华春莹所言，开放、包容、多元，本来是美国建国之本、立国之基。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同样指出，从全球汲取人才才是美国得以维持其全球首要地位的重要原因。然而，如今的美国政府却背道而驰，在9月这个传统的开学季，再次拿教育问题开刀。驱逐中国在美国留学生，美国再次开了个坏先例，这不仅将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且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以足够合理的国家赔偿彰显正义价值

首席评论员 朱昌俊

9月2日上午，蒙冤近27年后无罪获释的张玉环在其国家赔偿案代理律师及家人的陪同下，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该赔偿申请主要包括五项：赔偿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0171564.5元；赔偿侵犯健康权赔偿金和后续治疗费100万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171564.5元；伸冤费用支出100万元，各项共计人民币22343129元。此外，张玉环还要求赔偿义务机关即江西高院在媒体和门户网站上公开向赔偿请求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错判带来的负面影响。

张玉环平冤归来后，他到底能获得多少国家赔偿，一直为社会所关注。现在张玉环申请的赔偿金额达到2000余万元，虽然是此前传言中“700”万元的数倍，但从舆论反应来看，它 also 获得了不少网友的理解和同情。这背后其实是社会对于国家赔偿价值认知的一种进步。

诚如张玉环在国家赔偿申请书中所写到的：无人愿意用27年的自由换取五百万或一千万的赔偿，太低的赔偿金不能体现正义的价值，无法抚慰冤狱所造成的创伤，不利于防范冤案的再次发生，因此请求按照国家日赔偿金标准的三倍进行赔偿。这一方面重申了一种现代常识——自由无价，国家赔偿理应体现出对自由的呵护态度；另一方面，表面看，2000多万元赔偿金属于“天价”，但却并非“漫天要价”，而是依据相应的规定提出的诉求。

张的代理律师就指出，张玉环共失去自由9778天，在被关押期间，他每时每刻都被限制人身自由，三倍于社会普通成员每日8小时的法定劳动时间，若以日均工资的一倍计算人身自由赔偿金，明显不合理。所以，“国家赔偿应与自由的价值属性相匹配，赔偿标准上应遵循‘就高’原则”。而从社会朴素理解的角度，张玉环是迄今已知羁押最久的蒙冤者，再多的赔偿其实都无法重新挽回他失去的自由，以及弥补自己身体以及家人、家庭所承受的伤害。更遑论，这仅仅只是申请的数额，最终数额还需要法院的裁定。

还认识到，在冤案纠错中，若社会简单把国家赔偿作“不值”来换算，这种对“自由”和个体权利的“功利性”认知，很可能正是冤案发生的现实土壤的一部分。因为不管是“疑罪从无”，还是禁止刑讯逼供，都是建立在对人的合法权益的绝对尊重之上。而“物化”国家赔偿的价值，恰恰是对冤案所伤害的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一种矮化。这种认知落到司法实践中，便很可能成为忽视司法程序、践踏个人权利的违规操作的一个诱因，最终为冤案埋下伏笔。因此，对国家赔偿的认知要警惕掉入某种功利性的思维之中，因为它不仅可能对受害者构成二次伤害，也可能弱化国家赔偿的真正价值。

而从冤案平反的角度来看，受害者申请国家赔偿远不是句号。一者，张玉环本人已经指出，和经济赔偿比起来，他更在乎的是恢复名誉。因此，这一次他同时要求相关责任机构向自己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二者，张玉环曾多次向媒体陈述自己当年遭刑讯逼供，但该案目前仍未启动应有的追责程序。而这一点，无疑是比国家赔偿更复杂，也更能体现冤案平反决心和诚意关键环节。所以，申请国家赔偿，只是此一冤案后续处置的步骤之一，社会还要把更多目光放于冤案生成的责任链条之上。

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曾为冤案受害者呼格吉勒图撰写了墓志铭，其中有言：“优良的司法，乃国民之福，呼格君生也短，其命也悲。惜无此福，然以生命警示手持司法权柄者，应重证据，不臆断。重人权，不擅权，不为一时政治之权益而弃法治与公正。”而我们希望，张玉环案，能够以足够合理的国家赔偿，让司法机关和整个社会都明白，人身自由和正义的分量与价值。